

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 外交理论准备^{*}

——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

杨洁勉

【内容提要】 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其外交理论准备既需要明确不同阶段的使命,也需要确立在各阶段理论建构的重点。从阶段性使命上看,这一外交理论准备由低至高包括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三个重要阶段。目前,中国的外交理论准备正从和平共处第一阶段向和平共生第二阶段发展,通过内生成长、外生互动和共生建设等途径建构和平共生理论。更长远的第三阶段使命是推进和谐共生理论,使全球关系在物质和精神上更上一层楼。从理论建构重点上看,中国外交理论在各个阶段的建构重点都既需要夯实基础理论或指导性理论,也需要强化操作理论或行动性理论,从而保障中国迈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的知行合一。就未来数十年的理论发展而言,中国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下建设好全球强国外交理论部分,要超越线性思维轨迹,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善于多维多向思维,建构、传播和引领新理论,并期待中国思想家和理论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关键词】 外交理论;和平共生;和谐共生;实践自觉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3)

05-0004-11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但所面临的环境已显然区别于历史上崛起的各大国,相应的物质准备和理论准备要求都已有重大差异。在物质准备方面,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深化,独立发展和独享发展已日益难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相应地,理论准备方面也提出对与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相匹配的中国外交理论需求。更为具体地说,中国迈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既需要明确不同阶段的使命,也需要确立在各阶段理论建构的重点。从阶段性使命上看,这一外交理论准备由低至高包括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三个重要阶段。^①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准备已完成第一阶段任务,逐步形成并发展了和平共处理论。^②在中国从全球大国向全球强国持续迈进的当前阶段,中国外交理论正在通过内生长成、外生互动和共生建设等途径建构和平共生理论。与此同时,中国还应着眼下一阶段的使命,和其他全球强国及所有国家共同推进和谐共生理论,使全球关系在物质和精神上更上一层楼。从理论建构重点上看,中国外交理论在各个阶段都既需要夯实基础理论或指导性理论,也需要强化操作理论或行动性理论,从而保障中国迈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的知行合一。

一 内生和外生理论的互动互补

中国在完成迈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的第一阶段使命后,目前正致力于实现理论建构的第二阶段使命,即实现中国迈向全球强国外交理论的和平共生。这一方面要求中国继续建设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外交的内生理论;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广泛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通过内生理论与外生理论的良性互动,达到升华和优化理论的目的,实现中国外交理论的和平共生,为第三阶段的和谐共生奠定坚实基础。

(一) 内生理论的建构

中国虽然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还没有真正成为过全球性强国。中国在进入近现代社会后,经济和政治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并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对外开放时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和压迫。时至今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不仅对中国仍然

^① 根据《辞海》,“共生”亦称为“互利共生”,种间关系之一。泛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生物生活在一起的相互关系。通常表现为一种生物生活于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外相互有利的关系(参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0-731页)。近年来,“共生”被引入国际关系语汇,出现在中国政府文件(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和一些学者的论文中。本文从“内生”(产生于一国之内)、“外生”(产生于一国之外)和“共生”(国际社会共同建构的相互依存)等方面分析世界强国理论。

^② 有关中国外交和平共处理论的探讨很多,但总体上并未将其当做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的阶段性使命之一来加以分析。

充满着傲慢与偏见,而且还不时予以排斥和打击。^①因此,中国在走向全球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亟须基于中国的内政外交特别是和平发展的主要实践和理论,建构内生的中国外交理论。

1. 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内生理论已具备基本条件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第二,国土面积第三,也是体育强国和文化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两大基本国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高速增长,在当前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趋成熟,在外交方面已经具有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和胡锦涛外交思想等思想理论宝库。中国的特色理论、发展道路和成功经验不仅使中国日益充满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而且还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非西方选择和借鉴。

2. 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理论传统是中国全球强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在探索和分析历史发展轨迹时,很早就形成了文史哲三者互通的优秀文化传统。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强国不仅是指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还指文化和道义力量。中国的先秦诸子是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周期来看待国家兴亡的,提出过许多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的强国之道,他们普遍认为国家间秩序取决于国家间领导权的性质,即王道还是霸道。

孔子、孟子和荀子认为天下是一种道义权威,因此将道德修养和推行仁政视为王道,是王天下的基础,即“内圣外王”。荀子认为内圣是“尽伦者”,外王是“尽制者”。^②老子认为王道是一种天下归心的威望,其基础是为民受难的道德精神,并以百川汇集入海为例,指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③韩非子则认为王道是靠军事力量和法制制度维持的,即“夫王者,能攻人者也”,“故法者,王之本也”。^④对霸道着墨较多,且与王道有详细比较的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王道靠道德力量维持,霸道依赖的是物质力量,即“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

① 如同多项研究所说的,当前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仍是“美国的科学”,例如可参见 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687-727; Robert M. A. Crawford and Darryl S. L. Jarvi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owar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Albany: SUNY Press, 2001;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No. 3, 1977, pp. 68-82。

② 《荀子·解蔽》。

③ 《老子·六十六章》。

④ 《韩非子·五蠹/心度》。

王不待大”。^① 荀子认为王道和霸道都需要实力及道义这两种力量来维持,只是道义对于维持王道的重要性超过实力,所谓“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②

3. 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建设因顺应历史潮流而具成功可能

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不是谋求世界霸权,而是通过和平方式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阐述的小康目标再次印证了这点。中国在实践中长期坚持不称霸和不当头的原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同世界多国同舟共济时还明确反对“两国集团”(即“中美共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新领导集体接班后,已经多次重申中国不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由此可见,中国一贯坚持的理论和实践将保证中国继续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前进,并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4. 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兼具原则性和务实性

当理论与现实不符时,中国不是指责现实,而是调整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显示出中国在理论方面的探索性和务实性,中国理论建设的这一特点将长期延续下去。在今后30年及更长时期内,中国将从如何成为全球强国向如何当全球强国过渡,因而需要做相应的理论调整,例如扩大理论的利益观和价值观的基础,拓展理论适用的地域和领域,完善理论的系统 and 体系,增加理论的有效性等。

(二) 内生理论与外生理论的和平共处

当今时代对内生和外生理论的互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化时代,世界进入了相互依存的共生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在国际社会共生的大环境下才能得以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国际关系要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这体现了和平发展的时代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世界各国有益的实践和理论,而且中国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化的过程。国际关系本来就超出一国的范围,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集世界之智慧建全球性理论。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建构和发展全球强国外交的内生理论,还应该认真吸取外生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实现内生理论和外生理论的和平共处,在合作与竞争中共同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需要在互动中了解外生理论。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的五百年以来,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界和学界频繁互动,在诸如世界总体的大理论和经济、政治、外交等关系的分理论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① 《孟子·公孙丑上》。

^② 《荀子·王制》。

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和克伦威尔时期的“均势理论”为其在维持同欧洲大陆关系时得以发展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鼓吹和推行扩张主义。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权力均衡思想比德皇威廉二世独霸世界和征服世界的理论更为高明,因为前者最大限度地为实力尚未完全强大的国家争取到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俄国彼得大帝扩张主义的两位继承人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都非常重视以“体系”和“秩序”推进俄国在欧洲及世界的地位。在20世纪初,美国政治家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都有其时代性的世界观、体系观和价值观。与此同时,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国际关系逐步成为独立的学科,其对全球精英阶层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二战后欧洲联合自强的完成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来源。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相似历史遭遇和共同历史任务为两者的理论互动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寻求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力图在内生理论和外生理论的结合中建立更加有效和更富时代性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高潮中,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提出“潘查希拉(Pancasila)”,即印尼独立的五项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奉真主);“加纳之父”克瓦米·恩克鲁玛(Nkrumah Kwame)推行泛非主义;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把他的理论概括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大纲领性口号,即“庇隆主义”。长达百余年的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孕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另一方面,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需要在互动中扬弃和升华。中国在近两百年的理论探索中,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口号。从李鸿章到孙中山,主要试图从西方列强的理论中获取启迪和摹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执政的前30年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既有成绩也有弯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才走向更加成熟和有效。

理论的互动是中外各种思想、理念和观念的比较和碰撞,是超越有形物质互动的无形精神互动,因而是更加深刻和全面的互动。中国内生理论只有在与外生理论密切的互动中才能做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各种强国理论都有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在今后的理论互补性问题上,中国负有双重责任。一方面,中国需要继续汲取外部世界的一切优秀和进步理论;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介绍自己理论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和启示。正如中国以自身实力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商品互补中赢得了世界市场的一席之地,中国的理论“走出去”也需要更具主动性和进取性。

只有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认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强不霸”的理论才能贡献于外部世界。

二 共生理论的创新

中国全球强国外交理论第三阶段的任务是实现从和平共生向和谐共生的提升。国际共生并非始于今日,但当前的全球化却使国际共生更加迫切和可能,“任何国家的‘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程度,所能上升的高度,除了自身内部条件和努力,不仅离不开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成果,而且只能在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① 中国在和与其他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进程中,既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也需要与其余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共生理论的创新。

(一) 坚持理论基石和夯实共生基础

迄今为止的全球强国理论都是源于一国的和排他的,欧洲列强和英美霸权理论更是具有以大欺小和以强凌弱的特点。但是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物质方面的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的需求,使世界上第一次有可能建构强国共生的现实和理论。中国的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就是中国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推进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信息社会化,就是增加国际社会共生共赢的基础。我们所处的世界首先是物质的,因此加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安全和社会的合作是第一位的工作。但是,国际社会还需要从超越物质的角度来深化认识世界的物质关系,用共同制度来规范相互间的利益和权益,用共同理想来争取更多和更大的共生共赢。此外,我们在重视物质财富的同时,还需要建设精神财富,加大对理论建设的投入力度。争取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双赢是中国全球强国理论的基石,加强中国和国际社会人类共同体的建设则是国际共生社会的努力方向。只有在此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之下,国际社会的共生基础才能得以建立和夯实。

(二) 共同建构共生理论体系

尽管世界强国共生理论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但国际社会的相关理论建设既不能是碎片化的,更不能是权宜性的。理论体系的建设需要全面规划和缜密思考。首先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和要求。当前世界正处于从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过渡的十字路口,如果人类社会能够把握历史机遇,或许就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方式

^① 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4页;金应忠:《为什么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第1-17页。

实现全球强国共生共赢的伟大理想。反之,人类社会就会丧失机遇,仍将长期摸索。其次要准确界定主要内涵和条件。全球强国共生理论涉及的地域和领域难以计数,但其主要内涵则应聚焦于“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核心理念。在条件方面,不仅要反应性地描述,更要创造性地塑造,根据变化而不断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再次要探索基本规律和逻辑。在以欧美为主导的过去五百年的世界近、现代史中,力量的剧变往往会引起政治经济板块的挤压和变形,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军事摊牌中决一雌雄。^① 这些规律和逻辑是否会在新时期内重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时代和形势的判断和反应。最后是反复实践检验和引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正确与否,必须在实践中检验。为此,首先应将中国的理念转化为实践,并在日益积累的实践中上升为理论。中国还要努力推动其他行为体共同践行全球强国共生理论,并在实践中修正和调整,使其更趋成熟和完善。

(三) 有效应对各种理论和实践挑战

尽管我们正在努力为共生共赢的理想而奋斗,但世界毕竟还充满着种种竞争、博弈和冲突,需要我们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当前,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和相关全球性治理机制缺失的实践和理论挑战。在现实挑战方面,中国应当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口问题、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水安全等问题,向世界提供有关的物质和理论公共产品。在未来挑战方面,中国还要和国际社会共同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全球强国理论的逻辑和推理的共识,规划世界的未来走向,在诸如国际体系建设、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社会管理、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做出贡献。而把应对现实挑战和未来挑战统筹结合,更是对全球强国共生理论和实践的更高层次的挑战,这需要中国从现在起就应更加有效地应对。

(四) 增加共生理论的中国元素

中国的崛起史无前例,势必会极大地影响到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和国际趋势等。中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物质力量,还拥有巨大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力。首先,全球强国共生理论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上发展,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次,在近、现代史中西方的理论和话语霸权是一种历史的不公,现在到了予以纠正之时。中国是东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与时俱进的部分。正如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增添活力一样,中国等新兴大国也正在为世界理论注入新的内

^① 有关大国霸权竞争乃至战争的讨论,可参见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丕启:《霸权稳定论:批判与修正》,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23页。

涵。最后,中国是迄今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大国,其理论日益拥有世界意义,国际社会也在期待着更多的“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问世。^①

三 指导性和行动性理论的建构

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三个阶段使命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必须同时关注指导性理论和行动性理论两方面的理论要素,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否则,理论脱离实际的局面必将出现:或者是理论超前但不具可操作性,或者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而陷入“理论的贫困”。

(一) 指导性理论

就全球强国理论准备而言,指导性理论系走向全球强国的基本理论,如从普鲁士时代到冷战后的德国均势理论、英国在维护欧洲均势下的海外殖民扩张、美国建国后百余年的“孤立主义”理论等。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 一般意义

全球强国指导性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目标。近、现代以来,追求成为全球强国的大多数国家的目标是称霸世界,因此它们只能是以邻为壑,踩在别人身上前进。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德国、日本等都是这样。但是,二战结束以来也有新的变化,国际社会希望以扩大总体利益增加个体利益思想和战略日益增多,进而希望以共同规制达到和平共生的目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的共同磋商和相互协调明显增加,从而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

二是基本内涵。目标不同导致基本内涵的不同。欧美国家追求全球强国的理论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优等民族(上帝选民)、生存空间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②但是,中国的理论则是和平发展理论,强调合作共赢。

三是理论推广。虽然目标和内涵相异,但各国推广理论的方式和手段则大致相似。欧美国家在追求全球强国的进程中都很重视理论宣传,在公共舆论、学校教育、会议交流、民间来往等平台上使其理论成为本国主导理论和国际指导理论。

2. 特殊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① 中国不仅需要为世界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更需要提供战略性、安全性和思想性公共产品。参见张春:《试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三大使命》,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2期,第10-11页。

^②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性理论,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自不例外。但是,中国走向全球强国是个实践和理论的新命题,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指导性理论。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把先前在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提升到在全球传统和非传统事务的全面合作共赢,进一步凸显了全球性和地球村的特点。中国的这一高目标也是对中国自身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需要超越自身利益,进而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并且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从而达到各方共赢的目的。

(二) 行动性理论

顾名思义,行动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的应用性或操作性,根据时间长度可分为远期(10年以上)、中期(5-10年)、近期(5年以内)三种理论。

1. 远期行动目标理论

远期行动性理论兼有指导性和行动性的特点,但重点在于战略布局和贯彻落实之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日本的“雁行理论”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二战结束之时,法国政治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政治经济学家让·莫内(Jean Monnet)就开创了捐弃前嫌和联合自强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三步走”战略和20年战略机遇期等也属此例。当代世界事务和各国内政外交需要远期理论和战略的指导,但由于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大都以两任为期,只有少数具有战略眼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才会努力建构指导十年以上政治纲领的行动理论,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缺憾。

2. 中期行动部署理论

如上所述,当代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受任期的限制,一般只能做出5-10年的行动部署,因此很难有周密的理论,即使有理论,其重点也在于“早期收获”之上。当然,也有例外,例如,20世纪70-80年代,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通过接触改变”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保守主义理念执政;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执政理念。

3. 近期行动实施理论

大国在追求全球强国地位时的近期行动实施理论重点在于其谋略性和应对性,如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理论、印度政府的“东向”政策等。尽管近期行动实施理论的重点在于应对,但它比“有政策无理论”更具计划性和系统性,因为政策被赋予理论后得以更具稳定性和可复制性。

四 当前的阶段性任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理论建设任重道远,中国需要在总体和长期理论发展方向的指引下,制定出当前切实可行的阶段性(2013-2022年)目标。

(一) 提高举国的理论认同度

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举国一致的理解和认同。首先要有正确和适用的理论,这是中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要历史使命,努力使理论系统化和科学化。其次,理论建设不应局限于理论学术界,当前要抓好两方面的教育:一方面,需要提高党政军各级领导的理论和认识水平。毋庸讳言,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各级领导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的理解具有单一和实用的倾向。在很多情况下,领导和群众的理论与信息处于同一水平,难以发挥领导和引导作用。现在亟须补课,加强干部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教育。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关系的一大特点是民众的广泛参与,但因缺少理论指导和引导,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益抬头。因此,需要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教育普及工作。

(二) 重新定位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

在革命与战争理论向和平与发展理论转换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和界定价值观、意识形态与文化在理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里,对于诸如市场经济等问题采取理论上不争论但实践上加强探索的态度,这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办法,但不应长期固定化。中国在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征途中,无法长期绕开理论争论和竞争问题。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应做好和做足功课,使国际社会从理论上接受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应当说,这一工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在理论建设中,往往会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提出相应的原则、精神和理念,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洲精神”、和谐世界理念等。中国所倡导的原则、精神和理念其实就是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反映,问题在于要梳理好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使之逐步成为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充分发挥日益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制度优势

当前,就中国的全球强国理论准备而言存在“三个失衡”:一是在中国在实际部门和理论部门综合统筹方面存在制度失衡,二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失衡,三是在社会科学内部存在“国内理论”和“国际理论”、应用理论和基础理论等

的失衡。而且,在全球强国理论研究的有限经费中还存在分配和使用不当的问题。由此可见,落实中国“五大优势”^①的发挥问题可谓任重道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 结论

中国成为真正的全球强国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两者的任务都很艰巨,但理论建设的难度更大。在未来数十年的理论发展历程中,中国需要逐步完成以下四项任务。

第一,中国的全球强国共生理论需要在更大的理论框架中予以完善。中国的全球强国共生理论孕育和问世于内外两个大局互动的实践,成长和发展于内生和外生理论的互动碰撞。因此,全球强国的共生理论需要远远超越狭义外交理论,在更大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予以建构和发展,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下,建设好全球强国共生理论这一分支体系。

第二,中国的全球强国外交理论需要超越线性思维轨迹。中国的和平共处、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和理论大都正向阐述但缺少逆向思维,容易导致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不符、指导性理论和战略思维脱节、行动性理论和现实政策异步等问题,这些都需要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予以很好的解决。

第三,中国建构全球强国共生理论需要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再好的理论如果孤芳自赏或束之高阁,也难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认同,就起不到理论指导作用。中国正在试图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这具有历史创新的时代意义,因而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建构、传播和引领新理论。

第四,中国建构全球强国共生理论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优秀思想家和理论家。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and 贡献,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政治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共同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一批国际超一流的专家学者,使之成为共生全球强国的引领者。

[收稿日期:2013 - 04 - 06]

[修回日期:2013 - 04 - 22]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习近平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 91 年的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参见《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召开》,载《人民日报》,2012 年 6 月 30 日第 1 版。